

曹贵宝 李广 王红升等 著

邙水朱华

邙下文人集团研究

河北人民出版社

邺水朱华

——邺下文人集团研究

曹贵宝 李广 王红升等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邺下文人集团概说	(1)
第一章 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	(11)
第一节 曹操	(11)
第二节 曹丕	(24)
第三节 曹植	(33)
第四节 邺下七子	(47)
第五节 蔡琰	(57)
第六节 邺下文人集团其他作家	(60)
第二章 邺下文人集团的作品	(67)
第一节 诗歌	(67)
第二节 辞赋	(89)
第三节 散文	(101)
第四节 小说	(129)
第五节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137)
第三章 邺下文人集团的总体特征	(142)
第一节 时代特征	(142)
第二节 文学特征	(149)
第三节 邺下文人集团与建安文学繁荣的成因	(159)
第四章 邺下文人集团的地位和影响	(168)
第一节 邺下文人集团的地位	(168)
第二节 邺下文人集团的影响	(170)
第三节 20 世纪以来建安文学研究综述	(173)
附 邺城通论	(184)
第一节 邺城兴起的原因	(186)
第二节 邺城的建筑形式	(197)
第三节 邺城的衰落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5)
后 记	(228)

邺下文人集团概说

汉末是社会大动荡、秩序大混乱、形势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儒学大崩溃、思想大解放、个性大张扬的时期,更是文人大觉醒、文化大活跃、文学大发展的时期。在这样大树将颠的背景之下,邺下文人集团逐渐在邺城形成、发展、壮大,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绚烂的文化宝藏和无尽的文化遐想。

一、邺下和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即邺城,古地名,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汉献帝建安时期(196~220),曹操在此经营,使邺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曹氏父子喜好文学,奖励风雅,加之邺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来到邺城,连舆游宴,吟咏诗文,抒写悯时伤乱、救世济民的悠悠心曲和壮烈情怀,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个彬彬之盛的文学家集团——邺下文人集团。这一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主要成员有王粲、刘桢、徐幹、陈琳、阮瑀、应瑒、蔡琰等人,人数达百人之多。他们受曹操任用,或在政府、军队中担任各种职务,或做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在曹氏父子的鼓励下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使建安时期的文学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汉末的政治社会现状

自桓灵以来,东汉皇权逐渐旁落,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政治腐朽,经济停滞,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进一步打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东汉政权,社会的政治中心更加弱化。中平六年(189),在外戚与宦官争斗的过程中,董卓趁机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由此进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

在皇权削弱、政治大一统遭到破坏、社会急剧动荡的同时,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汉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儒家经学已不再是文人思想学术的唯一追求,人们的价值观念、人格行为、生活方式、人生追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文学的变化是以人的变化为前提的。这一时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

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进取、务实的姿态,追求建立功业,拯济天下。在此过程中,文人有感于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兴衰荣辱的难以把握,思想更脱出了汉儒“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有了更深刻的思索,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随之发生变化。由于他们感慨良多,文学抒情言志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加之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邳下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曹操出场了。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曹操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壮大,公元196年,曹操以他的远见卓识迎汉献帝到许昌,改年号为建安(196—220),从此,他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了政治上的优势。这以后,他灭袁绍、平北方,攻占并进一步营建了邳城,使之逐渐成为了当时北方事实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由于他实行“外定武功,内修文学”的政策,全国的文人名士如群星拱月,纷至沓来。从建安九年(204)攻占邳城到建安十三年(208),短短几年时间,邳城就聚集了上百名的文人士,真是群星璀璨,震烁古今。从此,中国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建安时代,而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几乎都在邳城,邳下文学几乎成为了建安文学的代名词。

三、邳下文人集团的形成

具体来说,邳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首先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建安九年(204),曹操攻下邳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中心。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谁也没有能力再用武力统一全国,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此时的曹操便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放在了重要位置。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尽快吸引活跃于乱世的各种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成为曹操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他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为自己所用。由于思贤若渴,重才爱才,在曹操的政治召唤下,全国各地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邳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建安十年(205),陈琳、阮瑀依附曹操;建安十三年(208),王粲归附曹操;短短几年内,徐幹、应瑒、刘桢、邯郸淳、路粹、丁仪、杨修等一大批人相继汇聚到曹操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他们战时随军打仗,归来习文作诗,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关心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渴望统一的政治理想以及为此而建功立业的抱负,描写男女爱情的忠贞和离愁别恨,抒发个人理想的空落和个性受压抑后而引发的怨恨情绪等,形成了邳下文学的主流。

另一方面,当时的文人士之所以能聚集邳下,也与曹氏父子的雅好辞

章有很大的关系。

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高水平的文学家。他在恢复社会秩序、巩固政治统治、发展经济的同时，一贯重视文化建设。早在中平元年(184)他担任济南相时，便有“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的理想^①。建安八年(203)，打败袁绍取得北方的统治权不久，又颁布《修学令》要求恢复礼教，指出：“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曹操对文化和文人的重视。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一段话：“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里，“悉集兹国”四个字，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曹操对文化和文人的重视。^②另外，蔡琰流落匈奴，曹操命专人持金币赎归。可以说，曹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文士才俊。

曹操不仅重视文化建设，而且他本人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年二十，举孝廉”，“以能明古学，复征拜为议郎”^③，“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④他“雅爱诗章”^⑤，身体力行进行文学创作，“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⑥，为邺下文人集团作出了表率。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乐府诗的诗人，也是第一位大量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言：“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成为了邺下文坛的领袖和“建安风骨”的开创者。曹操还是一位文论家，虽其文论不存，但从《文心雕龙》所记片断来看，曹操所论涉及诗、文、赋，对邺下文风的建立，也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曹操对文学的这种态度和他的创作实践，无疑深深地影响到了曹丕和曹植。他们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对文学的爱好和投入的精力，更是超越了曹操。在繁忙的军事战争之余，他们以贵公子的身份与邺下文人们交往，同文人们“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⑦“行则连舆，止则接

① 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3页。

② 同上。

③ (晋)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

④ 同上，第54页。

⑤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3页。

⑥ 同④。

⑦ 同⑤。

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一起吟诗作赋，诗酒唱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带领邺下文人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促进和带动了邺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

文士们归附邺城后，曹操不仅在政治上重用他们，而且积极组织文学活动，为文人从事文学创作提供条件。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建筑铜雀台，修建铜雀苑，并筑金凤台、冰井台，或商讨国家大事，或饮酒赋诗，更使文人雅士有了一个固定的吟咏抒怀之所。在曹氏父子的文学实践和示范带动下，加上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创作条件，文人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文学才能不断被激发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曹操父子的爱才之心和政治召唤、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以及曹氏父子的文学才能和对文学的嗜好，是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

四、邺下文人集团成员和创作概况

邺下文人集团的代表作家众多。如前所述，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既是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又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核心，王粲、刘桢、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孔融等邺下七子是骨干成员，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吴质、繁钦、丁仪、丁廙、荀纬等是重要人物。

从总体上看，邺下文人的创作，随着他们人生际遇的不同和个人生活境况的变化，鲜明地呈现出两阶段的特征。

归邺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长期战乱，亲眼看到割据者的烧杀掳掠、社会生产的空前破坏，饱尝忧患，饱经沧桑，身感乱离的悲怆，因而对普通民众的灾难有着较为深切的感慨与同情，有拯世济物的雄心和建功立业的愿望，希望能施展才干，为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做出贡献。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主要表现为建安前期作品所共有的特征，即描写社会动乱、关注社会政治、抒发个人抱负和功业理想成为他们创作的共同主题。

归邺以后，他们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清代著名诗论家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①；“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②。的确，曹丕曹植兄弟的创作实践，鲜明地体现了邺下诗歌由汉代之雄浑转向邺下靡丽的演变轨迹。具体来说，文人们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也有一些关注社会生活、表现个人志向、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继续出现，但总的来说，在曹丕、曹植兄弟的大力倡导和七子等邺下文人的积极响应下，文人们的创作主题更多地转向了表现个人性情、日常生

^① （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

^② 同上，第107页。

活,更多地致力于个人情怀的抒发,更多地体现出文士的个性,更多地关注自然景物,更多地同自己的生活联系了起来,显示出重个性、重欲望、求华美的特征,这种新的趣味,就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的“诗赋欲丽”的发展趋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邺下文人们归邺以后的这类创作,与他们前期的作品一样,同样是生命痕迹的一种体现。对他们来说,前期的诗歌主要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关注社会的历史命运,这固然与“大生命观”紧密相连。归邺以后,无论痛苦还是欢乐,仍然是自己生命的体验。游玩也好,斗鸡也罢,他们作品中的清词丽句并非是简单沉沦于感官享受的一种表现,而是真实生命的另一种写照。刘勰独具慧眼,他评论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①从这一角度说,邺下文人的创作是始终如一的,这尤其需要我们注意。

具体来说,邺下文学最主要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三类。

一是反映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汉末朝代易替之际,由于大一统思想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儒学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各种学说纷纷兴起。邺下文人打破传统创作的习俗,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他们抒写征战之苦,叙述民生之乱,创作出许多现实主义的优秀诗篇,打破了两汉以来辞赋独盛的局面。曹氏父子、邺下七子及其他文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抱负和理想,又都是军阀混战的目击者,因而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较深的感触,对普通民众的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因此他们用发自内心的心灵之笔真实描绘了自己目睹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惨破败的乱世景象。在他们的笔下,广大中原地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些近乎白描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幅惨目伤心的画面,反映出当时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成为当时社会的忠实记录。

二是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心志。邺下文人生逢乱世,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相联系,渴望能够建功立业,主动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曹操在《短歌行》中以千古名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大气磅礴地抒发了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宏大理想;在《龟虽寿》中喊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自己老而弥坚、志在千里之外的雄心;在《观沧海》中用沧海洪波、山川

^①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

树木等来抒发自己吞吐日月、“包举宇内”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壮志。曹植在《白马篇》中,通过对游侠的赞美,抒发了为国捐躯赴难的豪情胆识。另外,王粲的“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建功不及时,钟鼎将何铭”,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等诗句也都深刻反映了邺下文人忧国怜民、“拯世济物”的雄心壮志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豪情。

三是抒发个人情怀,表现日常生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邺下后期,随着战事的减少、生活的稳定,邺下文人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宴饮、田猎、游玩等娱乐活动,随之创作心态和表现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抒发个人情怀、表现日常生活的作品。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①。

不过,总的来看,邺下文人的作品还是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五、邺下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邺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道家哲学的自然旨向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是文学自觉的最基本的思想源泉。

其次,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在文学的创作心态中,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的功利目的性,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文学的审美趋向。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显示了多姿多彩的特点。

再次,文学自觉最显著的标志是文学理论的自觉。而理论的自觉,又是在人的自觉和创作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时期在汉末以来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形成了品评诗文的风气,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体裁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卓著的建树。尤其是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批评之风,为以后《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的诞生开了一个好头,推动了文学的自觉与进步。

从题材看,邺下文人们在诗歌、辞赋、散文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

^①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

成就。

诗歌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成为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从作家看,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四言诗又独具一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曹丕有“文士气”,“便娟婉约”^①。曹植是第一个致力于五言诗创作的诗人,也是邺下诗坛最杰出的诗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钟嵘《诗品》)。七子驰骛诗坛,骋才使气,使五言之作蔚然走向高潮。从诗体看,五言古诗的创作达到了鼎盛,四言诗也有异响,七言诗初创并有所发展,为其后形成从乐府、古体到齐梁新体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异彩纷呈的诗歌艺术世界奠定了基础。

邺下文人的辞赋沿着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道路发展,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讲究辞藻和形式工齐之美,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同时,题材更加广泛,抒情、咏物、感事、饮宴、游猎无所不至。代表作主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

邺下文人的散文,体式多种多样,有诏令、奏疏、章表、书信、序论、赞颂、碑铭等,形式自由。曹操的书信表令语言简练,清俊通脱。曹丕、曹植的书表体散文流丽酣畅,情采多姿,情味隽永。孔融体气高妙,阮瑀书记翩翩,陈琳章表殊健,各具风采。

继承、变革与创新,使邺下时期的文坛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使邺下文学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第一,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形成了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主体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邺下文人的作品有一个十分恰当妥帖的概括:“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②对邺下文学的这些特征,后人将其概括为“建安风力”、“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刘师培则把邺下文人为代表的建安文风具体概括为清峻、通脱、骋词、华靡(《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具体来说:

所谓“清峻”,即简约严明。其时,曹操以刑名法术为治,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气峭厉。文人所作,指事写意,亦皆不傍经典,直达所怀。文风清峻,乃成为邺下文学的一大特点。

所谓“通脱”,即随便之意。所以如此,实因为汉代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发现自我,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兼之沉浮于变幻的风云,目睹人间悲剧,人们深

① (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7页。

②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3页。

感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转而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人世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但总的来说,邛下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功立业、拯济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并未流于消极。慷慨悲壮,乃成为邛下文学的又一风格特征。

所谓“骋词”,即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的“壮大”。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这样的时代,打破了汉世守成的局面,当权人物结纳人才,不拘一格,为文人的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余地。因而文人议论时事、抒写情志,都力求充分地表现自我,并十分注重文章的思想逻辑与艺术表达的力量。气盛词壮,乃取代了东汉以来的拘谨典重。

所谓“华靡”,即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的“华丽”。东汉之文,“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两汉文章的由质转文,已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曹操虽质朴为文,但因文学已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其独特的个性开始受到文人自觉的重视,文学之渐趋华丽,乃成为时代的风气。

第二,学习而又超越了汉乐府的艺术表现手法,讲究抒情,格调高雅。邛下文人生长在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兴盛的时代,受此感染和熏陶,他们的创作不免具有很强的乐府色彩。但是,他们绝非简单的模仿、因袭,在学习借鉴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进行创作的同时,对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继承和创新。他们继承了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的精神意蕴,而同时又以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去加以改造,从而使乐府诗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追求抒情性,变以叙事为主的汉乐府民歌为以抒情为主的文人诗歌。二是追求高雅的格调,除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外,曹丕等邛下文人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使汉乐府民歌质朴粗犷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是注重内容的充实和语言的韵律。可以说,一方面,如果没有汉乐府特别是乐府民歌的巨大成就,也就没有邛下文人诗歌的辉煌。另一方面,邛下文人通过对乐府诗歌的发展,实现了对乐府的超越,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使古朴明朗的汉乐府成为一种适合于文人抒情咏事的新的诗歌形式。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比兴”的传统,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比兴”作为《诗经》创造的艺术表现手法,经过屈原的发扬光大,成为了我国古典诗词最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邛下文人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传统,非常重视

“比兴”手法的运用。他们在创作中借物抒怀,托事寄意,创作出了大量的名篇佳句,从而使“比兴”成为邺下文人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与《诗经》和屈原相比,邺下文人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又有着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色。《诗经》以来,一直到汉末以前,诗歌创作中所运用的“比兴”更多的是“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邺下文人诗歌中所运用的“比兴”则不同,它们更多地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例如曹植的《白马篇》、《吁嗟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以及《杂诗》中的“南国有佳人”等,其中所塑造的形象无不是诗人的自况,无不是诗人强烈主体意识的表现。又如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分别歌咏蘋藻、松树、凤凰,表面上看是咏物,实际上完全是诗人自身的写照。沈德潜说:“赠人之作,通用比体,亦是一格。”^①这所谓的“一格”,实际上就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第四,借用乐府古题而又自制新声,扩大了邺下文学的表现领域。曹操是邺下文人中借用乐府古题抒写时事的高手。他的诗,不论是四言、五言还是杂言,都是借用乐府古题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抒写自己的理想抱负。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叙述历史、描写现实、反映时代的苦难;《陌上桑》本来是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来是写鲁国男子秋胡戏妻的故事,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霸业而前路坎坷和时势艰难的感慨。正因如此,沈德潜说:“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②曹丕、曹植兄弟和其他一些文人则与曹操不同,他们虽然也有借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诗歌,但大多还是自制新声。如曹丕的《燕歌行》、《大墙上蒿行》,曹植的《箜篌引》、《斗鸡篇》、《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吁嗟篇》等等,无不是作者根据抒情的需要和内心感受而自己创制的新题。

第五,叙事写景大笔勾勒,描情写态务求细密。邺下文人叙事写景,善于居高临下,抓住事物的大关目,从大处着眼,以极其显豁的笔墨勾勒出雄阔的画面。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都是用很少的笔墨,构成了苍莽的境界,勾画出无比悲惨的景象。《观沧海》写大海的景象,紧紧围绕一个“观”字,由“观”的视线分层写出:从水写到山,由山带出树木百草;看到草木的摇曳之态,眼前则突现惊涛汹涌之状。寥寥数笔就写出了大海的雄阔、浩瀚,给人以壮美的审美感受。在描情写态方面,他们借鉴了汉赋的艺术手法,比较注重运用铺排的表达方式,刻画更为细致。如曹植《吁嗟篇》刻画秋蓬飘转的重重坎坷:“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

① (清)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0页。

② 同上,第106页。

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惊飏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飘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诗歌极意铺排,把秋蓬出生入死、飞转不息的悲苦命运十分曲折细致地表现了出来。又如曹植的《美女篇》很显然是对汉乐府《陌上桑》的模仿,但是较之《陌上桑》,《美女篇》对人物的刻画更为细腻,描写妙有次第,表现出与《陌上桑》不同的艺术风格。故后人称赞说:“意致幽妙,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①

六、邺下文人集团的衰落

邺下文人集团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

从政治因素看,建安二十五年(220)初,曹操病逝于洛阳,这使邺下文人集团失去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同年十月,曹丕称帝,建立了魏王朝,定都洛阳,曹魏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随之西移。与之紧密联系,邺城虽仍为陪都,但它的繁华、它对文人的吸引力,已远非建安时期所能比。

从文学集团的成员来看,建安二十二年(217),发生了一场蔓延全国的大疫疾,在这场疫疾中,邺下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陈琳、应瑒、徐幹等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都未能幸免,先后辞世。此前,孔融、阮瑀已分别于建安十三年(208)、建安十七年(212)去世。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杨修、邯郸淳、路粹、崔琰、繁钦、刘廙、丁仪、丁廙等邺下文人,也于建安二十年(215)至黄初二年(221)间分别辞世。至此,邺下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已经十不存一。曹丕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领袖,虽然称帝后仍相当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他本人也创作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但由于个人身份地位、心态以及关注重点的变化,在艺术上已不能与邺下时期相比。邺下文人集团早期的重要成员中,只有曹植还作为政治上受打击的对象,在艰难的环境中苦苦支撑,个人政治生活的不幸反而成就了他杰出的文学地位,使他后期的创作达到了邺下文人创作的顶峰,也使他的作品彪炳于中国文学史册。

从上述可见,以曹操去世和曹丕称帝为主要标志,邺下文人集团这一群体迅速衰落下去。虽然由于曹植的存在,邺下余声还不时闪烁出一些灿烂的火花,但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作为一个群体的邺下文人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

^① (清)叶燮:《原诗》(霍松林校注),转引自廖宏昌:《刘勰论评三曹视角探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

第一章 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

邺下文人集团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成员多达上百人,其中成就较高的主要有三曹、七子、蔡琰等。下面择其主要人物而述之。

第一节 曹 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曹魏政治集团内部大力倡导文学创作,是邺下文学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为邺下文学的繁荣和后世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曹操的人生经历

曹操出生在一个虽有权势、却为当时的士族清流而鄙的家庭。祖父曹腾为汉桓帝时期的大宦官,官任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其父曹嵩本姓夏侯,为南阳县令夏侯睿次子,后被曹腾收为养子,桓帝末年官拜司隶校尉,灵帝时官至大司农、大鸿胪、太尉。

曹操年少时机智警敏,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二十岁的时候开始走上仕途,担任洛阳北部尉,因严肃法纪得罪当朝权贵,不久迁顿丘令。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由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积极参与到与黄巾军的作战中,因破黄巾军有功,随之迁济南相。后被征入洛阳,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从这一时期看,他在任上敢作敢为,不畏豪强,秉公执法,初步展现了廓清吏治、除残去秽的宏大志向,显示了不凡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胆识魄力,为在汉末乱世的军阀割据中大显身手并最终胜出积累了经验。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后,西凉军阀董卓乘乱带兵进入洛阳,专断国柄,肆虐京师,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又鸩杀太后。袁绍、袁术等以讨伐董卓的名义在东方各地起兵,不久即演变成为了一场军阀混战。曹操在董卓专权后逃离洛阳,聚兵 5000 人,加入了以袁绍为首的讨伐董卓的行列,从此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196),他把困顿徙转、走投无路的汉献帝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由此处于了十分有利的政治地位。建安五年(200),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他同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河北袁

绍军事集团对阵,消灭了袁绍的十多万大军,一举击垮了这个最强大的竞争者。随后,又经过几年的征战,到建安十三年(208)为止,先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军事集团。这一时期,曹操以他高明的政治策略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使自己在与众多对手的激烈竞争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

建安十三年(208)冬,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率军挥师南下,在赤壁与孙权、刘备军事集团进行了一场大战。由于骄盈轻敌,加上不习水战,又遇疫疾,曹军大败。以赤壁之战为标志,汉末的政治形势开始进入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后,曹操主要专注于巩固北方的统治。经济上,继续沿袭从建安元年(196)就开始推行的屯田制,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强兵足食,进一步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军事上,于建安十六年(211)把黄河上游纳入到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同东南的孙权集团和西南的刘备集团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大的战役,基本上互有胜负。政治上,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改革弊端乱法。为不拘一格广揽人才,他打破豪门士族的小圈子,实行“唯才是举”的方针,大批出身庶族寒门而有真才实学的人纷纷到邳城投奔曹操,造成“文武并用,英雄毕力”(三国志·王粲传)的盛况。为加快代汉步伐,建安十六(211),任命曹丕为副丞相,曹植等诸子被封为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本人封魏公,建魏国,置丞相以下尚书、侍中、六卿等百官,在邳城设立了一整套正式的行政机构。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又进爵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备天子乘舆,立曹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在西征过程中,66岁的曹操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病卒于洛阳。当年十月,他被代汉建魏的曹丕追尊为魏武帝。这一时期,曹操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其后曹丕代汉乃至西晋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毕生著述甚丰,后代流传的著作近20种,其中仅《魏武帝集》即有30卷。但原集至宋代皆已散佚,明代张溥辑其零散作品,为《魏武帝集》1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书、尺牍、序、祭文、乐府歌辞等各体共145篇,清代严可均、丁福保等续有增补。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为底本,加以校订补充,并增入《孙子注》,出版了《曹操集》,为现今最详备的本子。

二、曹操的政治思想

由于出身于清流不齿的宦官家庭,曹操被当时的士人讥讽为“赘阉遗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他也“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之人所见凡愚”(《让县自明本志令》)。内心深处的自卑,使他对两汉素重家世、

经术的传统自然而然地持反抗态度。另一方面,曹操又是出身于地方豪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使他深知儒只可守成,不可进取,因而政教军事,颇杂刑名。他受先秦法家的思想影响很大,针对当时乱世的现实,揽申、商之法,强调“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拜高柔为理曹掾令》),特别重视法治,认为这是匡治时弊的良方。他对部下、对家人,都实行严刑峻法。曹植妻崔氏因“衣绣违制”,被勒令回家并赐死。他自己行军时马惊践麦,触禁令而割发代首,目的仍在于维护法令的严肃性。

但曹操毕竟生在汉世,其所受教育与面对的舆论,使他不愿以汉相之尊,蒙篡逆之罪名。兼之诸侯的互相牵制,本集团内部等级关系有赖礼教的维系,又使他无法断然否定儒家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规范。所以他曾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显然,曹操是宁愿由儿子来改朝换代的。此外,以曹操的地位与实力,他对夺取天下是充满自信的。但目睹汉室的倾颓、生民的不幸、命运的无常、人生的短暂,曹操又不免心怀惆怅。他疑惑于“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董逃歌词》),悲慨于“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秋胡行》其二),既以“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精列》)自解,又以“驾虹霓,乘赤云”,“绝人事,游浑元”(《陌上桑》)宽怀,更以“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秋胡行》其二)自勉。从以上角度说,曹操的政治思想又是儒法兼备的。

三、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文学创作具备了坚实的人生阅历基础,也使他成为了邺下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

曹操对于文学十分重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①同时,他还喜欢延揽文士,当时社会的诸多名士都纷纷投奔到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邺下文人集团。“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殄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②曹操不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领袖,同时他还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和高超的创作水平,成为文坛的宿将。由于在文学上的大胆革新,他的诗歌和散文起到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

(一) 曹操的诗歌

①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3页。

② 同上。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他的诗歌都是在繁忙的军旅生活中创作的,正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所说:“(曹操)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作品同其政治、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1. 曹操诗歌的思想内容

曹操现存诗歌有 20 首左右,均为乐府诗体,主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自己的宏大抱负。

(1)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自桓、灵以来,由于政治黑暗腐败,宦官专权,军阀混战,加上黄巾起义的冲击,国家长时期处于分裂动乱之中,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相对于其他邺下文人,曹操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他的诗歌“借古题写时事”,更自觉、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大动乱年代的社会现实,堪称邺下诗歌中描写社会现实的上乘之作,被明钟惺《古诗归》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薤露行》从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写起,描写了何进企图借助四方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先被宦官诛灭,又招来董卓杀帝、鸩后、烧掠、强迫朝廷西迁长安等事件,概括了由于汉灵帝“所任诚不良”,外戚宦官相互倾轧导致国家基业倾覆的历史教训,真实再现了“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的历史景象。无怪乎陈祚明感叹道:“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感填胸,此第一高手。”^①

《蒿里行》当作于建安二年(197)以后,通过描写关东州郡推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继而各怀异志、互相攻灭、造成新的混乱的历史事实,同样以触目惊心的笔触描述了战乱中人民大量死亡、社会极度荒凉残败的凄惨景象,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这首诗暴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反映了人民遭受的灾难,抒发了诗人的悲愤之情,为情造文,慷慨凄怆。曹操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动荡悲惨的广阔社会画面,使人触目惊心。后人评价此诗,“‘铠甲’以下极言伤乱之惨,真朴、雄阔、远大极矣。……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②,确有见地。

在任何社会动乱时期,普通民众都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说“兴,百姓苦”的话,那么“亡”则百姓更苦。置身于汉末乱世之中,曹操亲眼目睹了“白

^①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转引自唐会霞、李世忠:《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3期。

^②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